

高原与盆地：从地理单元文化演进看晚商时期的“西土”社会*

豆海锋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000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Shang period, the “Western Territories” (*Xitu*) can be divided into hierarchical geographic units, with “plateaus” and “basins” constituting the region’s primary geographic divisions. This study approaches the late Shang *Xitu*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ic units,” explor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changes and soc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in this zon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formation of large-scale cultural geographic units reflects political unifica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among populations. Conversely, the more fragmented these cultural geographic units are, the more heterogeneous the populations become, resulting in greater social instability. It was the geographic advantage of the Zhou people that enabled them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plateau and basin populations within the *Xitu* region, gradually achieving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geographic units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Shang collapse.

Keywords: Late Shang *Xitu*, cultural geographic unit, social evolution

摘要：晚商时期的“西土”可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地理单元，“高原”与“盆地”是该地区最为主要的地理区划。本文以“文化地理单元”为视角，讨论晚商时期“西土”地带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和社会演进特征。考古现象揭示，大区域“文化地理单元”形成是政治统一、人群观念认同的表现，而“文化地理单元”越破碎则人群越杂乱，社会秩序则越不稳定。正因周人所处的地理优势，其将“西土”区域内的“高原”与“盆地”人群予以有效整合，逐步实现了灭商前“文化地理单元”的统一。

关键词：晚商“西土”；文化地理单元；社会演进

据考古发现，晚商时期商王朝的统治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商文化分布与早商时期发生了较大差异^[1]。这种考古学文化分布与王朝统治范围不相对应的现象，被学者称为商周考古研究的新问题^[2]。因统治形态的变化，商王朝之外的诸多

区域逐渐突显自身特色，在受商王朝政治影响及特有的地缘关系下，形成了与“大邑商”关系复杂且各不相同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晚商时期的“西土”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谓晚商时期的“西土”，考古学者多有论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黄土高原与中华文明形成机制研究（2022JZDZ026）、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藏民族大学）专项招标课题“‘半月形文化带’青铜时代冶铸遗存研究”、陕西省高校“黄土高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青年创新团队”的阶段成果。

及^[3]，一般是指晚商时期分布于商王朝核心区的西方，在地理空间上，一般指太行山以西及其西部的黄土高原地带，主要包括晋南、豫西及陕西关中、晋陕高原及邻近地区。商代晚期“西土”区域内，考古发现有诸多文化面貌不同的考古遗存，正是地理环境与地缘关系导致不同区域文化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在立足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对晚商“西土”考古学遗存文化性质分析的同时，关注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从地理单元文化演进这一侧面考察“西土”的社会结构，以期对晚商时期中心与周边的政治关系有深入的理解，对商代社会结构有进一步的理解。

一 地理单元的划分

实际上，晚商时期的“西土”往往超出了地理空间的范畴，其更多被赋予政治含义。由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欠缺及其自身的局限性，目前尚不能划分出明确的界线，而且，西土诸人群与商王朝的关系也存在不稳定性，对峙、战争、臣服在不同时期、不同族群中均有可能发生。因此，本文拟从大的地理单元出发，结合考古学文化格局演进，关注区域内商与“非商”的关系变化，探讨与商文化接触、影响区域的文化变迁，以此从文化地理单元角度窥探晚商“西土”社会的发展。从自然地理

特征出发，可将晚商“西土”区域划分出不同层级的地理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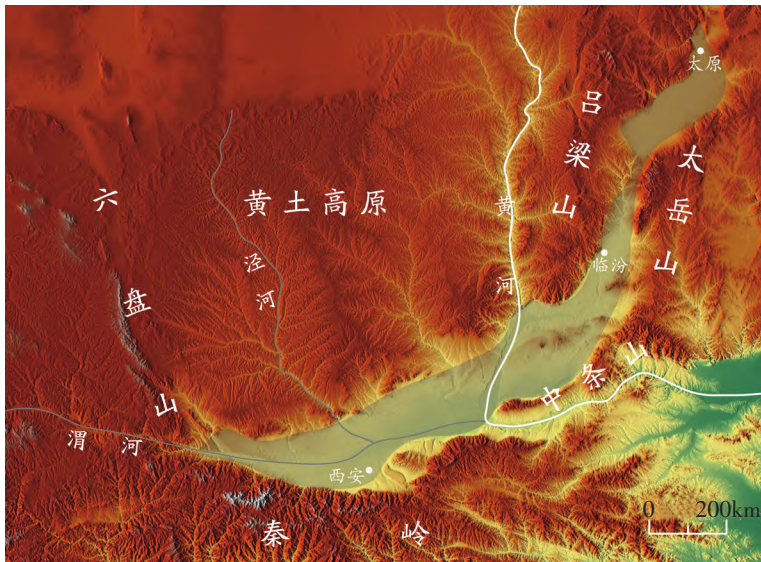
(一) 黄土高原与黄土高原边缘盆地

山脉与水系是划分地理单元的重要依据。我国地势呈西高东低的阶梯状逐层下降，以殷墟为统治核心的区域处于我国第三阶梯的华北平原区，向西处于第二阶梯的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海拔明显增高，多以高原、丘陵地形为主，有学者将这一区域考古所揭示的历史人群特征称之为“高地”社会^[4]。以晋陕高原为核心的黄土高原腹地，地形地貌复杂，黄土被流水切割侵蚀严重，形成了塬、梁、峁、丘陵、沟壑等地貌，平均海拔1200米以上^[5]，自然环境导致该地区的生业模式、文化特征与其他区域产生明显差异，可将这一地理单元称为“高原”地带。

“高原”的边缘包括关中盆地、晋南盆地、晋中盆地等地理单元构成了“半月”状的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秦岭、中条山、吕梁山、子午岭、陇山等纵横向山脉构成了黄土高原南缘的多个盆地地理单元，诸盆地间及其与黄土高原之间通过河流水系及山间隘口相互连通。可将黄土高原南部边缘的诸盆地简称为“盆地”地带。“高原”与“盆地”在空间地理上相互依存（图一），文化与人群方面交流频繁。由此，晚商“西土”可从宏观角度划分为两个大的地理单元：“高原”地带在环境、生业、气候等方面明显区别于商王朝的核心区；“盆地”地带成为商王朝核心区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在对峙时期，“盆地”便是商与“高原”人群争夺与拉锯的地带，也是文化缓冲与交融的地带。

(二) “高原”与“盆地”内部的地理单元

“高原”地带依据地貌类型可划分为北部黄土丘陵区 and 南部黄土台塬区。丘陵区多以峁、梁、沟壑等为地貌形态，地形支离破碎，很难见到较大面积的台塬地貌；黄土丘陵与边缘盆地之间存在着以黄土塬为主要地



图一 晚商“西土”的地理单元

中原文物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貌,其特点是塬面较大,宽大的台塬适合古代农业的发展。

“盆地”地带依据水系与地貌特征,可划分为不同的地理单元:关中盆地是由渭河干支流冲击而形成的平原,盆地内可分为渭河阶地区,渭北台塬区,山麓冲积洪积区等地形;晋西南盆地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汾河下游,该地区背靠韩信岭,东依太岳山、中条山,西、南以黄河为隔;晋中盆地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依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盆地呈东北-西南走向;豫西的伊洛盆地地处黄河以南,渭河平原及秦巴山区以东,南临南阳盆地,北有邙山,南为熊耳山、伏牛山等山脉,形成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6]。

需要说明的是,对更小地理单元的考古学研究,也可揭示不同区域内文化、聚落与社会信息^[7]。空间与文化景观的差异都是地理单元划分的依据^[8],由于更小层级地理单元的考古学研究往往受材料的局限,本文主要从宏观地理单元角度分析区域文化演进,并非对所有地理空间进行全面分析。

二 晚商时期诸地理单元内的文化格局演进

随着考古发现日益增多及研究不断深入,“高原”与“盆地”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以下对各地理单元内考古学文化演进予以简要分析。

二里岗上层时期关中盆地东部已归于商文化分布区,该区域所见诸多早商文化遗址,文化面貌与郑州地区近乎一致,学者称其为早商文化“北村类型”^[9]。早商时期,晋南地区也是商文化的分布区^[10]。这一时期,“高原”地带所见考古遗存较少,目前所见主要以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为代表^[11],在朱开沟文化墓葬中发现有铜戈等商文化因素,说明两地人群存在交流与互动。

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与地理单元对应关系单一,“高原”与“盆地”区分较为明显,两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地理单元”^[12],此种地

理格局的形成,表现出地理空间与考古学文化特征上的契合。这种文化分布态势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早商文化在晋陕高原外围形成了“钳形包围”^[13],充分说明商人的统治意图。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特征直接展示了商王朝强势统治力,亦显示了“高原”地带与商王朝统辖区存在明显的空间界线。

(一) 第一阶段

殷墟一期或稍早,区域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诸“盆地”所展现的文化特征不相一致。

关中东部地区以西安老牛坡^[14]、赤栏桥^[15]、羊元坊^[16]等遗址为代表,文化面貌与商文化相近;铜川耀县北村遗址也有这一时期遗存^[17]。自早商文化第三期开始,商文化继续向关中西部扩展,遗址点向西推进到岐山、扶风一带^[18]。关中西部形成了商文化“京当型”^[19],内涵不似“二里冈类型”单纯,其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从文化分布空间来看,商文化在关中地区的分布范围已达到最大。几乎同时,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20],于漆水河及泾河中游为中心的区域形成了郑家坡文化^[21],其与“京当型”商文化面貌迥异,应代表了不同人群。雷兴山先生分析周原遗址商时期遗存认为,周原遗址商时期第一期遗存属于“京当型”,其与郑家坡文化是两支并行发展、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郑家坡文化的年代上限也早于殷墟一期^[22]。

刘家文化这一时期形成^[23],其主要分布于关中盆地西端邻近陇山及秦岭山前地带。北部山地的麟游、泾河中游干流与部分支流发现有与刘家文化较为相似的碾子坡文化遗存^[24],两类遗存文化面貌较为接近,均以高领袋足鬲、带耳罐等为主要陶器,墓葬见有偏洞室,墓内多发现石板、石块,头龕或侧龕较常见。学者指出,碾子坡类遗存和刘家文化的关系应为同一文化的两个类型,与郑家坡类遗存的关系应为两支年代同时、并行发展的不同考古学文化^[25]。以刘家-碾子坡文化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分布在“京当型”商文化的西、北外围区域,依靠陇山、秦岭及北山,对

关中西部形成“半包围”式的文化分布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分布于关中西部的“京当型”商文化遗存中,除了含有大量商文化因素之外,在扶风壹家堡^[26]、老堡子^[27]、岐山王家嘴^[28]、礼泉朱马嘴^[29]等遗存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朱开沟文化因素,所见花边鬲、蛇纹鬲等因素显示出“高原”因素的到来。张天恩先生将朱开沟文化分为三期,年代相当于早商晚期(殷墟一期前后),是朱开沟文化的变化与扩散阶段,分布范围主要在陕北的西北部,从早到晚有向西南移动的趋势^[30]。关中西部所见朱开沟文化因素,正是这种南下文化浪潮的产物。

这一时期位于黄土丘陵东侧的李家崖文化兴起^[31],晋南盆地所见商文化遗存稀少^[32]。张忠培等先生认为,大约从殷墟一期之后,分布于晋中地区以太谷白燕早商阶段遗存为代表的土著文化,演变为以汾阳杏花村遗址晚商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并称之为“杏花类型”^[33]。杏花类型文化因素较为复杂,既包括晋中本地更早遗存的遗留因素、商文化因素、商文化与本地融合因素及李家崖文化因素等。学者通过详细分析,认为杏花类型是在商文化强势主导下的晋中南地区土著文化遗存,因与商人的紧密结合而呈现出异常浓厚的商文化因素,其意义在于共同应对来自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的东进^[34]。

这一时期与早商时期所形成的稳定的“文化地理格局”有所不同,黄土丘陵和黄土台塬地带的人群逐渐南下,一方面打破原有的文化格局,黄土台塬及其邻近的关中西部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兴起,区域内文化多样性特征已经形成;另一方面,商文化与“非商”文化的空间区域变得边界不清,关中、晋中、晋南等盆地出现了多种文化格局,商文化地方类型、深受商文化影响的地方文化依然在维持着早商时期的基本“文化地理单元”,但这种格局已危如累卵。

(二) 第二阶段

殷墟二期前后,碾子坡文化沿泾河继续南下,占据了部分郑家坡文化孙家类型的地理空间,如在旬邑县枣林河滩^[35]、孙家^[36]、西头遗

址^[37]发现这一时期的碾子坡文化遗存。刘家文化在宝鸡一带迅速发展,“京当型”消退。郑家坡文化在漆水河及关中北部黄土台塬区依然可见,在淳化县的枣树沟脑遗址见有郑家坡文化遗存^[38],似乎是因为碾子坡文化的南下,导致这一时期泾河沿岸孙家类型与其快速融合,以联裆鬲为代表的自身因素却变得稀少。这一时期,刘家-碾子坡文化在关中北缘西段形成了汇合之势,这种文化发展趋势应是导致“京当型”文化消亡的重要原因。

关中东部地区以西安老牛坡遗址为代表,其文化面貌与商文化已有较多差异,学者多将这一时期及稍晚关中东部的考古遗存称之为“老牛坡型”,认为其文化性质属商文化^[39],有学者认为其与商文化有明显的区别^[40]。从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老牛坡类型在陶器面貌上与殷墟文化的差别日益渐远,但墓葬葬俗、手工业技术方面与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晋陕高原西侧分布的朱开沟文化继续发展,据学者研究,这一时期该文化已经分布于延安一带^[41]。东侧南流黄河两岸分布的李家崖文化得以快速发展,大量铜器、高等级聚落与大型墓葬的发现,充分显示出这一人群的强盛态势^[42]。正是因为“高原”人群的兴起,晋南盆地出现了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以浮山桥北为代表的高等级人群^[43],不同地理单元文化面貌的差异,以及高等级人群的出现,显示了“高原”与“盆地”人群的对峙加剧。

上一阶段晋南地区发现遗存较少,文化面貌不甚清晰,而这一时期商文化遗存数量增多,特别是高等级人群的出现,主要仍以汾河东侧山地作为商文化遗址的分布带,而汾河以西及吕梁山地所见遗存仍以李家崖文化或李家崖文化与商文化融合的形态存在。李家崖文化向东冲击的晋南盆地,也出现了文化的混合区域,出现更加多层的文化地理单元。

整体上,这一阶段来自“高原”地区的诸文化继续向南,向东扩张,由西向东依次分布的刘家-碾子坡文化、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在

中原文物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影响效果。正是各地理单元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率加快,导致地理单元内出现诸多遗存文化面貌相异,这种不同一方面与地理环境及文化互动通道上多种文化因素汇聚有关;另一方面与各类文化进退速率快慢有关。这种南下的文化冲击力不仅促生了本地文化焕发活力,更使得本地接受了更多新鲜因素,促进了人群结构、生业模式及生产技术方面的革新。

(三) 第三阶段

殷墟三期前后,随着“高原”地带诸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盆地”内考古学文化格局也发生了较多变化。刘家-碾子坡文化汇合于关中西部,泾河流域所见碾子坡文化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已发掘的旬邑枣林河滩聚落于这一时期衰败,这一现象或许与大规模人群迁徙有关^[44]。周原遗址第二期遗存发生了较大变化^[45],居址与墓葬出现多种文化特征,这种变化一方面与刘家-碾子坡文化的融合有关,另一方面郑家坡文化也参与在这场文化的大整合过程中。

泾河中游的淳化枣树沟脑、黑豆嘴^[46]等遗存发现较多来自晋陕高原甚至更远地区的文化因素。朱凤瀚先生将以黑豆嘴为代表的青铜器称之为“黑豆嘴类型”,判断其年代约在殷墟文化二、三期之际,并认为其与来自陕北的“绥德类型”有密切关系^[47]。关中东部的老牛坡类型仍然延续,其自身文化特征更加凸显,与商文化核心区的发展轨迹有所偏差。李家崖文化南下至关中东部,在黄河沿岸的韩城^[48]、合阳^[49]、华县^[50]等多个地区遗址中见有此种因素。晋南地区商文化遗存数量较少,这一时期晋南盆地与“高原”之间的关系更多以融合为主。晋中盆地杏花类型显示出商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特征。

该时期“高原”地带向东的文化影响似乎更柔和一些,高原人群向南部关中盆地的冲击力更为强大,子午岭两翼南下的“高原”人群动力十足。

(四) 第四阶段

商末周初是关中盆地文化整合的阶段。周原遗址所见的6a(王家嘴地点)、6b(礼村H8为代

表)段遗存,周公庙遗址第1、2段,孔头沟遗址第1、2段、壹家堡遗址第4段等遗存被学者指出其文化面貌的复杂性^[51]。王立新先生指出,自周原开始,逐渐扩及周边,形成了一种由多元文化并行到相互融合的一个发展趋势,这一时期遗存表现出较大范围的交融性和结构上的非稳定性,其应是关中西部商周之际的“过渡期”遗存^[52]。其实,这种大的文化融合不仅见于关中盆地,黄土台塬地带也显示得异常明显。泾河中游碾子坡文化因素在该区域逐步退出,而出现多种因素整合的现象,部分陶器与周原为代表的周文化核心区保持着密切联系。于此同时,泾河流域的西头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量商末周初时期的墓葬^[53],居址内也发现了文化因素整合阶段的遗存,墓葬中反映的商文化因素表现得异常显著,这大致与商末部分与商王室关系密切的人群被安置于此有关。

关中东部的老牛坡类型衰退,商末逐渐整合的“先周文化”东进至关中东部。与此同时,晋南及晋中盆地出现了以酒务头^[54]、浮山桥北、灵石旌介^[55]等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殷墟四期时“杏花类型”出现了一类侈口弧裆陶鬲,虽然器形上多保持了商文化与土著文化因素融合式陶鬲的特征,但裆部特征及口沿的变化又可看出周文化因素的影响^[56]。

黄土台塬地带所见遗存与来自黄土丘陵的李家崖文化互动加剧。大量北方系兵器与装饰品流入黄土台塬地带,淳化县枣树沟脑、耀县丁家沟^[57]、甘泉阎家沟^[58]等遗址所见遗存充分体现了文化间的互动。泾河流域出现大量来自李家崖文化的因素,三足瓮、北方系青铜兵器与装饰品的出现,说明区域内有大量“高原”人群迁入,而陕北南部及黄土台塬地带发现的周式因素,“重食”铜礼器的出现^[59],说明黄土台塬和子午岭两翼是文化互动最为激烈的区域。南下因素也进入到关中腹地,华县东阳遗址部分单位出土的鬲、瓮口沿多饰花边,鬲足较肥硕等特点,与李家崖文化遗物相似,其年代为殷墟晚期或商周之际^[60]。

黄土台塬地带不仅有“高原”文化因素的南下,亦可见以周原为核心的关中盆地文化因素的北上,这一特征在泾河流域、陕北南部等地均有体现,如刘家文化的高领袋足鬲在旬邑西头遗址也有发现^[61],泾河流域与周原及附近地区普遍出现横绳纹鬲,这都显示了黄土台塬地区与关中西部地区文化整合加速。值得注意的是,关中东部李家崖文化因素在此分布,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华县东阳遗址所见遗存应与李家崖文化的后裔有关^[62],这也充分说明了周人对来自“高原”地带人群的安置。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商末时期汾河以东山前地带分布着商文化高等级墓地,并呈线状分布,具有政治对峙的态势^[63]。而高原地带的李家崖文化已渐衰落,关中北部黄土台塬地带所见的诸文化也处于整合阶段,逐渐与以周原为代表的文化特征趋同,表明多元因素融合下的周文化正在焕发活力。

这一阶段,从关中盆地到晋南盆地的文化分布态势形成了“弧状”分布带,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文化分布态势相近,“盆地”与“高原”分界明显,商文化依然在晋南东部山地驻守,只不过这一时期与商文化对峙的并非“高原”人群,而是已经融合形成了“复合体的周人”或“周人集团”,后者占据了“盆地”,并与“高原”人群融合,背靠“高原”,在“盆地”形成了“弧状”文化地理单元,与商文化形成明显的对峙格局。

三 从考古发现看诸地理单元的社会特征

由于晚商时期“西土”诸地理单元人群与社会结构复杂,这里仅对考古资料充足的“文化地理单元”进行社会特征分析。

(一) 晋陕高原

近些年,随着李家崖^[64]、柳林高红^[65]、清涧辛庄^[66]、寨沟^[67]等遗址的发掘,李家崖文化的社会面貌逐渐被揭开。在黄土丘陵地带,分布着密集的李家崖文化聚落,据曹大志先生调查统

计,晋陕高原晚商时期遗址数量达406处^[68],其中多数遗址的文化属性归于李家崖文化。在这些聚落之中,可看出明显的聚落等级差异,且形成了聚落的“多中心”特征,如柳林高红遗址发掘大型建筑基址和夯土墙;辛庄遗址发现一组由主体建筑和两级回廊组成的大型建筑遗迹,总面积达4200平方米,是目前殷墟之外发现的商代晚期规模最大建筑遗迹^[69];寨沟遗址内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等不同功能遗存或遗迹,分布在相邻的不同山岭上,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中寨沟盖面积约2万平方米,盖顶平坦、留有大量夯土遗存^[70]。晋陕高原晚商时期发现多处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71],寨沟等遗址发现的大型墓葬充分说明此处存在最高等级贵族。与此同时,诸如青铜器、绿松石、雕花骨器等稀有遗物只发现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高等级贵族掌握了铸铜技术,并对商王朝的礼制予以接受,如青铜礼器组合、墓葬形制、殉车葬俗等与商社会有互通联系,说明李家崖人群在不断与商王朝互动,寻求社会等级与秩序的有力维护。有学者指出,随着晋陕高原人群的兴起,正是“高原”人群的步步紧逼和戍边人员得不到及时“更新”,才导致商人节节败退^[72]。通过以上可看出,李家崖社会结构复杂,与商王朝的关系异常密切,其应是晚商时期商王朝西北方非常强大的区域方国。

(二) 关中盆地

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东郊灞河东岸的二、三级阶地上,秦岭北麓余脉骊山西南侧横岭塬的边缘。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73],该遗址被认为是关中地区夏商时期重要的聚落。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考古调查工作,确认该遗址现存区域面积约140万平方米,远大于以往对该聚落的认识。调查发现疑是夯土墙遗迹,夯土墙体位于遗址中部的东部边缘区域^[74]。通过聚落结构研究发现,在聚落内部遗迹种类丰富,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灰坑、墓葬、车马坑、陶窑、炼炉等,遗物有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陶器,陶范,炼渣,卜骨及石器等^[75],充

中原文物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分说明老牛坡晚商聚落结构复杂,聚落功能规划明显,有学者认为老牛坡遗址是关中地区晚商时期重要的区域性中心聚落^[76]。

关中东部老牛坡类型聚落分布数量有限,但分布范围较广,存在大小层级。在老牛坡大型聚落之下,关中东部目前已发现的西安东泔河^[77]、韩城陶渠^[78]、三原邵家河^[79]等遗址规模小于老牛坡。值得注意的是,秦岭山脉以南的汉中盆地宝山遗址中^[80],所见晚商陶鬲与老牛坡遗址所见十分相近,城固、洋县等地所见的青铜面饰^[81]等亦可在老牛坡见到,说明老牛坡是联系关中与汉中盆地的重要枢纽。另在关中东部发现多处晚商时期青铜器出土地点,这为老牛坡类型的分布和社会结构分析提供了重要条件。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老牛坡社会分层并不十分明显,聚落数量相对较少,或囿于考古工作的局限,虽部分遗址出土晚商青铜器,但文化面貌、聚落规模等方面还不清晰,反映出社会结构不完整,仅有老牛坡这一核心聚落功能完备,周边聚落对核心聚落的支撑力并不显著。因此,老牛坡遗址应是早商时期商王朝分布在关中东部的一个重要聚落,随时代的发展,老牛坡聚落成为晚商时期商王朝控制关中东部的重镇,其重要作用或与资源获取有关。商末,老牛坡社会逐渐与商王朝核心区的社会发展进程相脱节,更多的地方性特征日益凸显。

关中西部地区的晚商社会特征经历了一个由“多元”到“一体”过程。晚商时期多种人群活动于关中西部,刘家-碾子坡文化分布区域内,目前尚未有城址的发现,但考古资料显示诸聚落间已经出现等级差异,如泾河流域所见的碾子坡遗址,聚落面积约30万平方米^[82],聚落内出土晚商时期铜容器;而距其不远的枣林河滩、孙家遗址聚落面积不超过15万平方米,碾子坡与此两处聚落等级区分明显。郑家坡文化所在的漆水河流域也出现聚落层级的差异,郑家坡遗址是区域最大型聚落,其面积可达330万平方米^[83]。“京当型”商文化虽有多个遗址出土青铜器,但聚落等级特征不明显,尚不能窥其社会特征。至

殷墟三期后,随着文化融合与人群的迁徙,以周原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日趋完善。王家嘴发现大型建筑基址^[84],新发现商末周初双重城墙结构^[85],均展现周原遗址的都邑特征。周原以外分布着以孔头沟、周公庙、劝读、水沟等次一级聚落,此类聚落之下仍有多层级聚落结构^[86]。由此可见,以周原为代表的社会结构随着人群整合及聚落等级建构而逐步完善。商末时期,周原社会与“大邑商”在文化上的联系并不显著,但周原社会存在的礼器制度、生产技术等多方面都与商核心区表现出密切的联系,由此可判断,商末以周原为代表的社会应是与商王朝关系不甚稳定的区域方国。

(三) 晋南盆地

学者指出,晋南盆地晚商时期商文化或与商文化面貌相近的古代遗址基本都位于河汾之东,靠近山地的盆地边缘地区,有些遗址已进入山区^[87]。此外,研究显示,晚商时期聚落本身具有较高等级,酒务头带墓道大墓与殷墟十分相近,灵石旌介墓葬墓主等级较高,青铜器与商王朝核心区有较多的相近性。从聚落分布的角度来看,这些聚落周围基本不见同时期的中、低等级聚落^[88]。殷墟文化四期,西北边境的外来人群趁机南下,周人不仅阻挡了他们南下,也牵制了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扩张,使得他们没能进入临汾盆地^[89]。

四 结语

地理环境是产生区域文化和人群特征的重要基础,是揭示区域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晚商时期的“西土”,地理环境较为复杂,造成了人群与社会的复杂性。通过考古材料,可以从宏观角度反映商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关系,虽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可以区分“商”与“非商”属性,但在人群与政治关系与考古学文化方面却不能一一对应。从地理单元角度来看,在某一时期可划分出大的“文化地理单元”,在人群互动频繁之时,“文化地理单元”将被划分

得更加碎小,这种大区域“文化地理单元”形成是政治统一、人群观念认同的表现,而“文化地理单元”越破碎,则人群越杂乱,社会秩序越不稳定。本文所揭示的早商与晚商末期出现的“高原”与“盆地”两次大范围“文化地理单元”的出现,正是商王朝强盛及西周建国之前政治统一特征的反映。

综上,晚商时期“西土”社会的各地理单元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关中西部的周原社会实现了西土集团的有效融合,社会内人群与文化面貌由多元逐渐走向统一,社会整合与调适是周原社会形成的主线。关中东部的老牛坡社会,具有自身特色并与商王朝保持密切关系,继承了早商的传统,延续过程中逐渐地方化。从周人东进的态势来看,老牛坡社会与商王朝的关系较为稳固。晋陕高原的李家崖社会,多中心的社会结构显示出其人群的复杂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高等级贵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深受商的影响。生业模式脆弱,导致社会抗风险能力较差,与商王朝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对峙与融合是该社会演进的主线。晋南盆地以酒务头为代表的社会是“大邑商”防御西土的前沿,人群复杂,为高级贵族迁徙而来,军事防御性更强,尚未形成统一的社会结构。

甲骨文多记载武丁时期商王朝与西北地区族群战争频繁^[90],殷墟一期后,似乎商王朝与“高原”东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从李家崖文化所见大量商文化因素来看,商王朝对晋陕高原的影响十分强烈。有学者指出,武丁的夫人妇好就应来自山西晋中盆地一带^[91],充分说明了商王朝与这一区域的密切关系。晚商时期,商王朝的政治策略与早商时期有了较大变化,更多是与“边缘”地带的族群联合,并采用多种联合模式以达到统治目的。晚商时期的关中盆地是商人与“盆地”土著、“高原”人群等多族群融合与频繁更替的阶段,发展过程中,周人逐渐崛起,一方面如学者所说,商人扶植周人克戎,随着周实力走向强大,而商实力不断削弱,商、周逐渐对立,互不相容^[92];另一方面来自“高原”的人群不断与周

人融合,其实质是将“西土”区域内的“高原”与“盆地”予以政治整合。依托“西土”的地理优势,周人实现了灭商前“文化地理单元”的统一。

- [1] 刘绪. 商文化的纵横考察 [M] //中国考古学六讲系列·夏商周考古.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1, 39-72.
- [2] [60] 张天恩. 晚商西土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社会管理的认识 [J]. 江汉考古, 2020 (3).
- [3] 张天恩. 晚商西土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社会管理的认识 [J]. 江汉考古, 2020 (3); 田伟. 商代晚期的东西对峙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1 (2).
- [4] Li Min, *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2018; 李旻. 重返夏墟: 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 [J]. 考古学报, 2017 (3).
- [5] 李孝聪. 中国区域历史地理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以下有关区域历史地理的相关信息, 均引自该书.
- [6] 目前豫西地区晚商遗存发现数量较少, 文化面貌不清, 下文暂不做具体讨论.
- [7] 宋江宁. 关中地区商代文化和社会的结构与变迁——从地貌学对“水系古文化”的进一步理解和阐释 [J]. 文博, 2024 (3).
- [8] 周尚意, 孔翔, 朱竑. 文化地理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09-312.
- [9] 王立新. 早商文化研究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162-170.
- [10] [18] 王立新. 试论早商文化的分布过程 [M] //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 香港: 商务印书馆(香港), 1999: 335-362.
- [1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尔多斯博物馆. 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216-224.
- [12] “文化地理单元”与“自然地理单元”相对应, 是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对区域文化发展格局的一种认识. 赵善德. 从自然地理单元到文化地理单元——先秦珠江水系岭南地区文化遗存特征分析 [C] //暨南史学(第三辑).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13] 林云.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 [C] //考古学文化论集(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129-155.
- [14] 刘士莪. 西安老牛坡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 2000.
- [1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西安赤栏桥商代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24 (2).
-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长安羊元坊商代遗址残灰坑的清理[J]. 考古与文物, 2003 (2).
- [17]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C] //考古学研究(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283-342.
- [19] [23] [39] 张天恩. 关中商代文化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20]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4 (7).
- [21] 据张天恩研究, 郑家坡文化可分为“郑家坡型”和“孙家型”。张天恩. 关中商代文化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237-245.
- [22] [45] 雷兴山. 周原遗址商时期遗存与先周文化关系辨析[C] //古代文明(第7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89-211.
-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郊州·碾子坡[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 [25] 雷兴山. 蔡家河、园子坪等遗址的发掘与碾子坡一类遗存分析[C] //考古学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210-237. 为了行文方便, 以下将刘家文化、碾子坡文化统称为“刘家-碾子坡文化”。
- [26] 北京大学考古系. 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3 (1);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 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1986年度发掘报告[C] //考古学研究(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343-390.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原考古队. 2004年秋季周原老堡子遗址发掘报告[C] //考古学集刊(第17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28] 周原考古队. 2001年度周原遗址(王家嘴、贺家地点)发掘简报[C] //古代文明(第2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432-490.
- [29]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礼泉朱马嘴商代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0 (5).
- [30] [41] [62] 张天恩. 陕北高原商代考古学文化简论[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6 (9).
- [31] 祁冰. 李家崖文化年代再议[J]. 江汉考古, 2020 (1).
- [32] [34] [56] 武俊华. 商王朝经略山西高原的考古学观察[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4.
- [33] 张忠培, 朱延平, 乔梁. 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C]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283-290.
- [35]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旬邑县文物旅游局. 陕西旬邑县枣林河滩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简报[J]. 考古, 2019 (10).
- [36]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旬邑县文化和旅游局. 陕西旬邑县孙家遗址两座先周时期陶窑的发掘[J]. 草原文物, 2025 (1).
- [37]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旬邑县文化和旅游局. 陕西旬邑县西头遗址鱼嘴坡地点商周时期遗存发掘简报[J]. 考古, 2021 (12).
- [38]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淳化县博物馆. 陕西淳化县枣树沟遗址先周时期遗存[J]. 考古, 2012 (3).
- [40] 雷兴山. 对关中地区商文化的几点认识[J]. 考古与文物, 2000 (2).
- [4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清涧县博物馆. 陕西清涧县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24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清涧县博物馆. 陕西清涧县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24 (2).
- [43] 桥北考古队. 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C] //古代文明(第5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347-394.
- [44] Xiaojian Li, Wei Liu, Yongxiang Xu, Haifeng Dou, A Mark Pollard and Ruiliang Liu, Small site but big data: radiocarbon chronology for Zaolinhetao of the pre-Zhou culture in early dynastic China, Radio Carbon, Volume65, Issue6, December2023, pp. 1299-1321.
- [46] 姚生民. 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 考古与文物, 1986 (5); 姚生民. 陕西淳化县新发现的商周青铜器[J]. 考古与文物, 1990 (1).
- [47] [90] 朱凤瀚. 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J]. 考古学报, 2013 (1).
- [4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 据耿庆刚先生告知, 在韩城陶渠遗址发掘出具有李家崖文化特征的陶鬲等器物.
- [49] 据张天恩文章, 在陕西合阳县孟村寨子出土一件陶鬲, 年代约为殷墟二期或略晚的李家崖文化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家洼考古队曾进行过调查, 发现这是一处李家崖文化的遗址。张天恩. 晚商西土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社会管理的认识[J]. 江汉考古, 2020 (3).
- [50]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M].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8: 595-69-B;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华县东阳遗址(2014)[M]. 西安: 三秦出版

- 社, 2018: 42-43-图三〇。
- [51] 雷兴山. 先周文化探索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61-266.
- [52] 王立新. “先周文化”探索的再思考 [C] //新果集(二)——庆祝林沄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76-192.
- [53]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旬邑县文化和旅游局. 陕西旬邑县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 [J]. 考古, 2024 (12).
- [54]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闻喜县文物局. 山西省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地发掘简报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2 (10).
- [5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灵石旌介商墓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57] 贺梓城. 耀县发现一批周代铜器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 (11).
- [58] 王永刚, 崔风光, 李延丽. 陕西甘泉县出土晚商青铜器 [J]. 考古与文物, 2007 (3).
- [59]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 [J]. 考古与文物, 2009 (1).
- [61]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旬邑县文物和旅游局.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南头村地点西周灰坑(H154)发掘简报 [J]. 文物, 2023 (10). 该件陶鬲编号H154⑦: 5, 该件陶鬲高领, 沿下有小鏊, 袋足肥大, 尖锥状实足跟外撇, 与宝鸡一带所见高领袋足鬲十分相近。
- [63] [87] [88] 田伟. 商代晚期的东西对峙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1 (2).
- [6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李家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 [6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吕梁市文物局, 柳林县文物旅游局. 山西柳林高红遗址2007年发掘简报 [J]. 中原文物, 2019 (6).
- [66] [69] 种建荣等. 陕西清涧辛庄商代遗址 [M] //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52-55.
- [67] [70] 孙战伟, 于有光.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发现陕西晋高原等级最高晚商墓地 见证高度发达青铜文明和区域政治中心 [N]. 中国文物报, 2023-7-7 (5).
- [68] 曹大志. 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9 (7).
- [71] 曹玮. 陕北出土青铜器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韩炳华. 晋西商代青铜器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72] [89] 韩炳华. 再论晋陕高原商代青铜文化的谱系 [C] //西部考古 (第15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20-33.
- [73] 刘士莪. 老牛坡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2010年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22 (3).
- [7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老牛坡遗址聚落范围调查简报 [J]. 中原文物, 2021 (1).
- [75] 李彦峰. 聚落与地貌: 老牛坡遗址研究的新角度 [J]. 考古, 2022 (8).
- [76] 宋江宁. 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商代关中的考古研究 [M]. 台湾: 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8: 202-207.
- [7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西安东甘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24 (2). 发掘简报认为该遗址商代遗存的年代为殷墟一二期, 对发表材料来看, 部分单位的年代应更稍晚。
- [7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材料, 据耿庆刚先生告知, 在陶渠遗址西赵庄地点发现老牛坡类型灰坑。
- [79] 马琴莉. 三原县收藏的商周铜器和陶器 [J]. 文博, 1996 (4). 张天恩在其关中商代文化研究, 一书中对该遗址的年代进行分析, 认为所见陶鬲的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三期。
- [80] 豆海锋. 城固宝山遗址商时期遗存相关问题探讨 [J]. 考古与文物, 2010 (8).
- [81] 赵丛苍. 城洋青铜器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82] 考古发掘报告中称, 南郊州碾子坡遗址东西700米, 南北700米, 总面积500万平方米, 应为笔误。2024年, 我们组织人员对碾子坡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 确认遗址面积不小于30万平方米。
- [83] [86] 郭士嘉, 种建荣, 雷兴山. 周原地区商周聚落形态初探 [J]. 考古与文物, 2024 (11).
- [84] 周原考古队发掘材料, 见陕西宝鸡周原遗址2020—2021年发掘收获 [M] //202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2: 105-110.
- [85] 赵茁轶, 张琪悦. 宝鸡周原遗址考古取得新进展 [N]. 陕西日报, 2024-12-29 (3).
- [91] 陈小三, 武俊华. 妇好、子方与并地 [J]. 南方文物, 2023 (2); 许伟, 卜工. 万邦林立 “有娥”乃大 [J]. 中国文物报, 2021-12-3 (5).
- [92] 程平山. 亶父至武王年代兴周事迹考 [J]. 文史, 2021 (3).

(责任编辑: 向祎)